

与灵魂一路返乡

——评《黄冈秘卷》 □刘小波

刘醒龙新作《黄冈秘卷》是一部集大成之作，是作者多年创作积累的进一步冶炼和结晶。作品具有百科全书式的风貌，同时具有全景扫描历史的野心。小说线索繁复，主线是家族叙事，同时多条故事线并行不悖，写历史也写当下，写风物也写人情，写物质也写精神，写父辈的革命史，也写父辈的爱情。小说重心是关于父辈一生的书写，但也有“我”与少川的情感纠葛，同时还有对孩童辈的描写。小说既展现出作者的历史姿态，也有一定的现实批判。总体来说，小说是一部怀念故土故人之作，无论家族成员乃至普通人之间有多少的恩怨矛盾，最终似乎都得以化解，成为一部“和解”之书，这是一种典型的晚期风格，最终通过文字，让灵魂回归故乡。

家族叙事

中国是以家本位为传统的，家族叙事书写成为文学的大宗主题，直至《红楼梦》达到顶峰。后辈作家们一次次向《红楼梦》致敬，试图将家族书写延续并提升至新的高度。当代文学的这一主题更是司空见惯，家族叙事除了与家本位有关，与叙事空间的设置有关，也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相关。中国历来有“皇权不过县”的传统，家族在很多时候充当了基层自治和自治的工具，家族伦理影响了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刘醒龙习惯于家族叙事，大部头的《圣天门口》便书写了鄂东地区雪家和杭家两个家族的百年遭遇。《黄冈秘卷》也是一部家族书写的典型作品，故事并非围绕某一个人展开，而是围绕一个大家族——刘家大坑展开。小说涉及的人物包括家族第一代的老祖父、老祖母，第二代的老十哥刘声志、老十一刘声智、老十八刘声明，第二代构成了家族叙事的主线，此外，“我”母亲、“我”自己、“我”的孩子、邻居们等各色人物也纷纷登场。王翊也是极为重要的一个人物，可以说是老十哥的补充和侧写。

小说一路设置悬念，直到文末才将父亲与海棠的情感彻底揭露清楚。尤其是老十哥的叶落归根，既是对组织最后一次贡献力量，更是命运最终的必然归宿，一辈子颠沛流离不停搬家，最终还是回到刘家大坑。加之死后的王翊也回到了刘家大坑，王翊与王先生的父子关系以及最终魂归刘家大坑，都表明他与这个家族割裂不开。这个家族并不是完全依靠血缘关系，更多的还是一种文化上的认同。老十一一直无子嗣是一种

隐喻，对孩子的锲而不舍正是对家本位的回应。到最后，老十一有了后人，促使他改变自己固有的价值观，冲突最终似乎都达成和解，成为一部理想化的家族书写，这里几无矛盾，也少冲突，紫貂愿意为老十一留下后代，即便是矛盾重重的老十哥与老十一最终也达成和解。

小说是一部致敬父辈的作品，无论是对父亲曲折的爱情书写，还是王翊对组织的看重，都是后人怀着一颗虔诚的心所进行的书写。作家进行家族书写的同时也进行了自我剖析，这是近期作家们的普遍行为，除了启蒙他人，更愿意解剖自己，小说中叙述者的作家身份被不断提及正是基于此。

历史书写

家族叙事的模式流行更多源于中国与国家之间的密切关联，国是由家组成，写家族风云，其实也是书写国家的历史进程。刘醒龙的小说一直有一种历史的自觉，他往往通过小说来叙述中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变迁。在《圣天门口》中便是通过家族的兴衰来书写中国百年的风云。《黄冈秘卷》是致敬父辈的小说，同时也是书写历史的作品，父亲的一生正好经历了一段特殊的历史。作家有对历史全景扫描的野心，用父亲一生的经历串起近百年的历史变迁。小说的主线修组织史、修族谱两条线索，两件事都与历史态度相关。小说体现出叙述者的历史姿态，具有新历史主义的特征和解构色彩，但更多的是在建构一种精神层面的历史观，用以观照现实。有些历史事件和大的时代背景一笔带过，如平型关战役、民间抗战书写等，作家主要通过个体记忆来描述历史。

作品书写了老十哥革命、反腐、退休的一生，展现了一位典型黄冈人一辈子的命运，通过个体命运的沉浮来反衬历史，花了大量的笔墨来书写老十哥对自己的事业和信仰矢志不渝的忠诚，对组织的绝对忠诚是对自己信仰的坚持，晚年对修组织史的重视仍是对信仰的坚守，不过，最终历史似乎形成了巨大的反讽，这些也正好展现出叙述者不动声色的历史姿态。

饶有意味的是，历史在最后也达成了和解，在小说中，作者承认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价值观，老十哥对《组织史》和老十八对《刘氏家志》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尤其是一直困难重重的续写《刘氏家志》最后变得极为轻松，

这正是和解的产物。但是对老十一的价值观，作者仍然保留态度，对投机分子的批判一直没有停歇，对作家而言，历史的忧虑一直存在。

现实批判



《黄冈秘卷》中历史和现实的反差对比十分明显，这又回到作者一贯坚持的现实批判。如王翊晚年凄凉的生活，老十哥则要接受老十一刘声智舍的退休金，这完全与他们的历史贡献不相匹配。在历史叙事中也有批判的态度，如关于森林火灾的书写，发生火灾的辖区负责人小冯反而成为英雄，一步步成长起来，这样的情节很值得玩味。不过，作家展现出成熟写作的气度，往往微言大义，感情极度节制却不失语言的力度。

具体的现实批判主要是与老十一的事业有关，由教辅材料《黄冈秘卷》使用者的散文为阅读素材切入展现这一“魔书”的运作模式，铺陈出商业浪潮下人性的迷失。刘醒龙以现实主义冲击波立足文坛，其小说一直关注社会、关注现实，具有明显的批判色彩。他在《痛失》中以丧失良知的孔太平为中心展开对官场的批判，在《天行者》

《黄冈秘卷》有如一幅山水画卷，将黄冈地区的人文地理、文化基因和历史风云立体呈现。它同时也是一部关乎理想信仰的小说。刘醒龙步入文坛多年，《黄冈秘卷》有对自己创作回顾检视的意味，呈现出一种典型的晚期风格，这种风格最大的特点便是“和解”，原谅他人，也与自己达成和解，最终灵魂得以返乡。



刘醒龙

中聚焦教育问题。《黄冈秘卷》则是这些素材的再度冶炼，可谓集大成之作。《黄冈秘卷》中老十哥、王翊等对组织不计回报的付出与当下的唯利是图一正一反形成对比。

对作家而言，影响的焦虑无法避免，可以说后人都是站在前辈肩膀上进行写作，除了他者的影响，作家自我也是一道屏障。刘醒龙却完成了突破，最为明显的是从物质转向精神，从形而下转到形而上的层面。这是典型的晚年风格，在小说中，作者更关注精神、理想、信仰，历史追忆与现实批判都是为主体的精神世界建构而服务。寻找灵魂的伴侣与归属，安放自我。老年的老十哥在孩子们成家立业后摆脱了经济上的困难，却出现了精神危机，借北童之口说出的当代社会厌食病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苦难，“我”与少川的高于男女爱情的暧昧关系更多的还是一种灵魂的交流，小说中不断提及的苏轼及其佚诗也是灵魂追寻的最好证明。

《黄冈秘卷》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小说，小说中哲理、伦理、教育、爱情婚姻等都有所涉及。同时小说也是一部风物志，作者对黄冈进行了全景呈现。地域不单单是地理意义的存在，小说中的

人物性格有一种狂放不羁的成分，这就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这些都在作者对地方风情的描写中被一一揭示出来。对黄冈人身份的反复强调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作者的地域情怀。整个家族的基因是典型的黄冈气质，从老祖母沿街乞讨却不矢志气始，到父亲自始至终不为组织增添任何麻烦，到孩子们的毫不逊色，展现了一个家族独特的气质，这种气质来自特殊水土的养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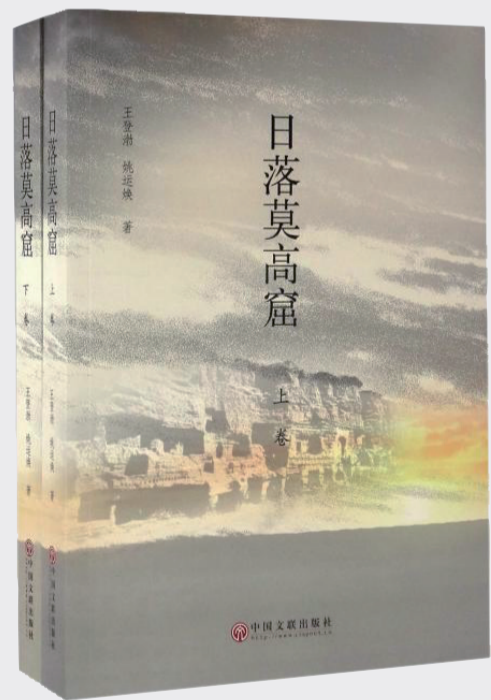
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将地方志融入其中，比如方言的使用、将父亲称为伯的传统、对巴河藕汤这一地域饮食的反复描写等，都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小说是地方性知识的全面呈现，是一部宏大的黄冈志。《黄冈秘卷》有如一幅山水画卷，将黄冈地区的人文地理、文化基因和历史风云立体呈现，它同时也是“一部关乎理想信仰的小说，父辈留下的遗产极为丰硕，有待进一步深挖。刘醒龙步入文坛多年，《黄冈秘卷》有对自己创作回顾检视的意味呈现出一种典型的晚期风格，这种风格最大的特点便是“和解”，原谅他人，也与自己达成和解，最终灵魂得以返乡。

(作者单位：《当代文坛》杂志社)

血与魂的悲歌

——读《日落莫高窟》

□王梦琪



《日落莫高窟》可称得上是一部历史题材的文学力作，它所涵盖的不仅是中国近代史、西部史、敦煌史，更涉及到中俄、中蒙、中日关系史、战争史等等，作者将这些史料融会贯通，在史实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想象和虚构，更为重要的是小说融历史、文化、人文于一体，充分展现了对莫高窟1000年来兴衰荣辱与悲剧命运的反思。

敦煌莫高窟一直是朝圣者与艺术家心中的圣地，神秘、奇幻、圣洁，而王登渤与姚焕运的长篇小说《日落莫高窟》以其开阔的思想、大开大合的笔触、纵横交错的情节吹散了历史的尘埃，将一个真实、有血有肉的莫高窟呈现了出来。同时，它更是一段鲜血淋漓、满目疮痍的历史书写，侵略与反抗、破坏与保护、官场的黑暗、人性的复杂，都被史诗般的笔调融合在一起，汇成一曲关于莫高窟的血与魂的悲歌。

莫高窟悲剧命运的必然性并不是盲目的推断或凭空的臆想，而是源于作者对历史的把握，这也是《日落莫高窟》明显区别于同题材历史、文学作品的一大特点。作者以其独特的视角为小说构建了一个广阔的时空背景，将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折射于一点，从而形成了角度多元、层次分明的叙述。“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的封建统治，俄国国内一片动荡不安，而中国也刚刚经历了护法运动，处于兵荒马乱的年代，加之帝国主义列强的虎视眈眈，孤悬西陲敦煌的时局便可想而知。如此纷繁背景下，汇聚了更加复杂的人群，因俄国沙皇倒台而流亡中国以阿连阔夫为首的哥萨克骑兵团，以史晋康为首的土匪团伙，古达云、邹季南带领的中

国铁血军队，以钟云逸、罗邦汉、张建候为代表的中央及西部政府的腐败官员，居心叵测的日本间谍山田，以及热爱、敬畏莫高窟的西部民众，他们在这个风云际会的历史舞台上充分展现着自己，就像一道支流向大河的支脉，他们相互碰撞、相互交融，最终掀起滔天巨浪。换个角度说，《日落莫高窟》可称得上是一部历史题材的文学力作，它所涵盖的不仅是中国近代史、西部史、敦煌史，更涉及到中俄、中蒙、中日关系史、战争史等等，作者将这些史料融会贯通，在史实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想象和虚构，为世事沧桑赋予了天马行空的翅膀，赞颂了那些为莫高窟付出了时间、心血甚至生命的英雄们，弘扬了官兵将士们沙场铁血、抵御外侮的浩然正气，更为重要的是小说融历史、文化、人文于一体，充分展现了对莫高窟1000年来兴衰荣辱与悲剧命运的反思。

多元的故事结构极大地提升了小说《日落莫高窟》的阅读快感。小说以双线并行的方式进行故事的整体架构，一条是阿连阔夫及其哥萨克骑兵团流亡中国经历和复国梦，另一条是白草不远万里到敦煌学艺以及她与邹季南之间纠缠的情感历程。一方面是铜皮铁骨、枪炮烈马的豪放情怀，一方面则展现了柔情似水、温婉动人的婉约之姿，两条线索交叉融汇，使得整个故事脉络呈现出一种刚柔并济的美感。围绕这两条主线的是更多或精彩或沉痛或复杂故事的穿插。古达云运筹帷幄，大败阿连阔夫，李雨东慷慨就义，关启仁不战而逃。白草则被土匪掳上山而与史晋康相识相知。这些情节的穿插不仅更加立体地展现了这一特殊时期的时代氛围与矛盾冲突，也为故事的后续发展埋下伏笔。两条并行的主线终于相交于敦煌莫高窟，便注定了这里的不平凡。小说下卷一开始政府官员们关于如何安置阿连阔夫及其部队的大讨论就描写得十分精彩，将陆甫澄、张建候等官员之间相互倾轧、推诿掣肘的丑恶嘴脸以对话、表情与心理描写的方式展现得淋漓尽致。不同身份的人群在各自利益的驱使下，逐渐形成了更为尖锐的矛盾和激烈的对抗。在邹季南与阿连阔夫的较量中处处暗藏杀机，邹季南对其部队实行人枪分离、人马分离的政策，不断削弱其战斗力，阿连阔夫则暗中与日本间谍勾结，以图后手。而邹季南与白草的情感纠葛也几经波折，冲动的欢愉、愤怒下的误解直至最后的情感爆发，两条线索不断升华，将整个故事推向高潮。每条线索各自发展，最终汇聚到一起，一个个看似偶然的经历与故事，在命运的安排下必然走到一起。正是作者这种独具匠心的艺术构思，使得整部小说情节更加饱满、厚实，又充满了戏剧性与张力。

波澜起伏又极富表现力的故事情节源于小说中人物的塑造。作者对小说中的人物塑造是真实而理性的，没有刻意贬低入侵者的形象，阿连阔夫虽然有其粗俗、莽撞的一面，但他不屈不挠的军人

气质与精神也深深地保存了下来，总体而言，他更像是一个悲剧式的英雄，而不是卑劣的侵略者与破坏者。阿连阔夫身边的犹太侍卫马久卡什虽然破坏了莫高窟里的壁画，但他在与卖油糕的女孩环环的交往中，却展现出诚实、可爱的一面。同样，作者也没有刻意去拔高保卫者的形象，邹季南一派儒将之风，勇猛果敢又喜爱诗书，但其性格中也不乏冲动、鲁莽的负面因素。白草对绘画与艺术有着执着的追求，她坚毅、刚强，却也容易在冲动下口不择言，不顾他人感受。正是这种多面化的人物塑造，才使得他们更加贴近真实，有血有肉，而不是成为脸谱化的形象。此外，人物的组织更多的展现作者对历史、对莫高窟的反思，唯利是图的王道士、视财如命的罗邦汉、阿谀奉承的陆甫澄，民众的冷漠与政府的腐败无知，才是造成莫高窟悲剧命运的根源所在。小说中有大量篇幅的对话，就像奥尔罕·帕慕克所说：“小说家的首要任务就是发明一个主人公，一旦作者成功做到了这一点，主人公就会像戏台上的提词员那样轻声地向小说家讲出小说的整个过程。”这部小说中的人物就像一个一个个故事情节的推进器，在展现自身形象的同时也完成了对整个故事的叙述。作者从人性的本质出发，并作出合理的描摹和假设，使人物思想行动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逐渐升华，最终达到了人性的真实。

色彩的运用及其意象的表达是小说《日落莫高窟》的一大特点。在小说开篇壮美的景色描写中便有充分的展现，嫩绿的草原、血红的夕阳、黑黢黢的剪影，这些极致的色彩如同一张张色块分明的幕布，将情绪笼罩在其中，绿色代表生命与希望，红色代表热烈与奔放，黑色代表严酷与死亡，小说就是在这样一种庄重、肃穆而又充满激情的情感基调中展开叙述。“白草磨天涯，胡沙奔莽莽”，早已失去了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壮美诗意，荒凉的沙漠与戈壁因战争的阴云与鲜血的洗礼被染成黑色和赭色。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中依然坚强生长的白色芨芨草，就如同小说中的白草，代表着一种坚韧、圣洁的力量，那是对艺术和理想的信仰，也是对国家和历史的坚守。小说的结尾处依然写到巨大的落日，这时的红色已近消散，热烈与激情过后是沉重悲壮的余韵，余晖散尽，大地一片昏暗……落笔之处，是蚀骨的悲哀与深刻的反思，就像题目一样，莫高窟依然摆脱不了“日落”的悲剧命运。

小说《日落莫高窟》是一部集历史性、现实性、创新性于一体的文学力作，两位作家十几年的呕心沥血、翻阅文献、勘定史实，以独特的视角、细腻的笔触、纵横的思想，展示出了一个传奇而又真实的莫高窟。在展示之上给予了深刻的思考，破除历史的蒙翳，翻开滚滚黄沙，将保护莫高窟先行者们的形象展现在我们眼前，充分体现出作家的担当精神。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

